

当今中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谋划推动青岛实现高质量发展，需把握全球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的演进趋势，深刻领悟“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部署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 一、全球产业分工发展阶段演进与趋势

#### （一）全球产业分工发展阶段回顾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产业分工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全球价值链。产业间分工起源于 18 世纪工业革命发生后，这个时期国际贸易对象跨越不同行业，如粮食和纺织品、瓷器和家具等。产业内分工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贸易对象主要是同一产业的产品，例如贸易双方彼此从对方进口轿车、家用电器等，企业因规模效应而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同时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交通、通信与能源领域的一系列技术变革，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显著低成本地推进国际生产体系的跨国重构，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通信成本和交易成本持续下降，运输技术大幅压缩了空间的“时间距离”和运输成本。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将产业价值链中可分解制造和组装的部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促进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演进到同一产品零部件和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和贸易。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体系理论家特伦斯·霍普金斯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了商品链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围绕最终可消费商品而发生的相互关联的劳动生产链式过程。此后，美国杜克大学格里芬引入价值链分析，提出了全球商品链理论。全球价值链发展导致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迅速增长，国际贸易重心从最终品贸易转移到中间品贸易，全球形成高度复杂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网络，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升，北美、东亚和欧洲三大区域供需网络基本成型，国际经贸规则深入边境后领域，基于信息流和服务流的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新模式、新动能、新规则正在形成中。

有学者根据中间产品跨境次数，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 GDP 分成三大类四部分：纯国内生产；直接生产出口的最终产品，即传统贸易；有跨境的生产活动，分为简单的全球价值链和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总体看，**全球价值链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量的比重于 2008 年达到峰值，纯国内生产活动占全球 GDP 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呈上升趋势，国际贸**



易重心从最终品贸易转移到中间品贸易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 （二）数字驱动的新型全球化形态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与结构再平衡的转型发展期，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放缓的同时，新一代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推动创新活动全球分工、服务业全球分工等新型全球化形态快速前进，**制造业贸易比重停滞，服务业贸易比重持续上升**，产业链数字化趋势明显。

服务业的许多环节要求生产和消费同时同地，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限制着服务贸易的发展。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服务的基本性质发生了改变，服务边际成本降至很低甚至到零，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显著，可贸易程度大大提升。许多生产性服务业借助数字技术，实现研发全球化、资产管理全球化、生产者服务平台全球化等，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

新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边界在逐渐消融，新经济如同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全面进入汽车、家电、石油、钢铁乃至教育、金融、保险和娱乐业。如果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观测，互联网经济正全面整合社会经济结构。

## （三）迈向碳中和的产业链绿色化

随着美国在拜登就任总统后重返《巴黎协议》，世界主要工业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难得的共识。此前，欧盟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和 2020 年 3 月发布了《欧洲绿色协议》和首部《欧洲气候法》，《欧洲绿色协议》提出，到 2050 年实现零

排放的碳中和目标，日本随后推出了碳中和的 2050 年方案。在全球绿色发展的新趋势下，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格局，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推动中国碳排放总量于 2030 年前达峰，争取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预计 2030 年前，中国碳减排需每年投入 2.2 万亿元，2030—2060 年需每年投入 3.9 万亿元<sup>①</sup>。

相较于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发起的“绿色新政”，碳中和目标更具发展道义上的标杆意义和减排行动上的引领性，对这一宏大目标的分解和落实将在中长期内直接影响全球生产和消费方式。能源转型和绿色创新将成为国际生产体系调整的重要方向和国际投资的热点领域，围绕绿色工艺产品资金投入和技术开发的国际合作潜力巨大，同时，这也将引发绿色标准体系主导权之争。在已确立碳中和目标的国家之间整合低碳资源，率先形成统一的碳市场和交易机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产业链、价值链的区域化倾向。在不断细化的减排目标下，不同行业价值链的“绿色级差”拉大，汽车等行业的制造范式和产品结构将发生颠覆性转型，化工、建材等传统高碳部门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排放洼地”的动机增强，以往被迫充当污染重地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能被进一步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黑色或褐色”环节。

## 二、国际贸易规则体系进入重塑变革期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一项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事业。

---

<sup>①</sup> 2021 年 4 月 15 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绿色金融和气候政策”高级别研讨会开幕式致辞。

未来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发展的关键在于弥合全球化的分化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妥善处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利益不平衡关系。“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

美国主导的经贸规则和制度体系，无论是从国内视角还是国际视角看，都完全被资本利益所裹挟，正以美国自身的标准推动建立具有很强排他性、“资本利益导向”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中国、巴西、印度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发展道路选择权则基本上不在美国考虑范畴。

“冷战”后的国际体系是在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其最典型的特征是经济全球化。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崛起以及区域化的广泛兴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不断缩减，同时面临全球化加速去工业化进程下利益受损国内群体的政治压力。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出台一系列反建制举措，要求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完全对等”贸易，标志着美国传统外交政策发生逆转，以西方为中心、基于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进入既“破”又“立”变革期。

在多边贸易体制层面，美国正在抛弃原有的“发展”理念。2019年，美国发布《一个无差别的WTO：自我认定的发展地位威胁体制的有效性》《2019贸易政策议程及2018年度报告》《关于改革WTO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总统备忘录》等多个文件，抨击WTO“过时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分法”，要求根据其制定的标准排除一些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并不排除在

今后剥夺上述标准未涵盖的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性待遇。如果完全接受美国的主张，那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要么被上述标准排除，要么在今后的部门谈判中被剥夺。WTO 发展到现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承认不同成员之间的差异性，通过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性待遇，在推动自由贸易的同时兼顾公平贸易，但这种规则导向正在出现逆转。

在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层面，美国也无法顾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反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设置了更高门槛。奥巴马时代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如此，特朗普时代的“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政策（以下简称“三零政策”）更是如此。TPP 不仅要求货物和服务市场的全面开放，而且对知识产权、电子商务、投资、政府采购、环境与劳工保护、国有企业管理、规则的协同性和透明度以及反腐败等新规则领域都进行了严格界定。这些高标准强化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亚太价值链上游和下游结构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与此同时却提高了发展中成员和非成员分享全球知识与科技进步的门槛，更将非成员排除在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之外。特朗普的“三零政策”从本质上来说比 TPP 的要求更高，不仅要求其他国家高度开放市场，更要让美国企业感到高度自由，实际是要求各国国内制度“美国化”。

**要深刻理解当前国际经贸规则“破”与“立”背后的规律和深层原因，必须从国际经贸规则形成逻辑出发，从历史与现**

**实交汇中寻求答案。**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武力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掠夺了大量财富，同时导致了这些国家大量民族工业的衰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此奠定了先发优势，并垄断了后进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纷纷获得政治独立，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向纵深发展，各国之间基于市场经济形成了不对称的经济依赖关系。美国在市场和科技领域的压倒性优势为自己创造了不对称依赖所带来的国际权力。规则本身意味着合作，合作则意味着必须给参与各方带来共赢的结果。**市场规模优势解决了合作者的收益问题，科技优势则解决了主导者的收益问题。两大优势为美国奠定了经济霸权基础，使其能够通过开放自己的市场来促进其他国家接受其国内规则，为其国内优势产业打开了其他国家的市场。**

当前，正是上述两大优势的变化使原有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动力发生变化。一方面，经济霸权的衰退导致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驾驭能力弱化，使得美国摇身变为现有规则体系的破坏者，特朗普时代的“以退为进”“先破后立”和“由内而外”三大战略显著改变了全球经贸政策。另一方面，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在努力通过扩大开放来维持开放型的世界经济，避免出现“金德尔伯格陷阱”<sup>①</sup>。

---

<sup>①</sup>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是“马歇尔计划”的设计者。他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在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后未能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取代英国的角色，在全球合作体系中继续搭便车，其结果是全球体系崩溃、世界经济萧条和世界大战。

### 三、市场是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原动力

市场既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内在动力，又是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原动力。正是在市场的驱动下，以商品资本、金融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等多种形式存在的资本，在一次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推动了各种市场的全球扩张和统一，由此也推动了贸易全球化和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建设。货物运输成本、技术传播成本和人员流动成本是市场全球化发展的三大限制因素。从历史视角看，三大成本下降程度的不同步，导致生产和消费在全球范围的分离也不同步，全球化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征，相应的规则边界和形式也不同。全球化通过“推动生产和消费在地域上不断分离”，消费者有了更多、更好的选择，企业有了更大的利润空间。

在交通运输受限年代，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被捆绑在有限地域范围，市场规模有限，市场全球化无从谈起。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机制成为世界经济运行的主导规律，全球经济走向紧密合作，国际经贸规则不断完善。货物运输成本的下降促成以货物贸易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时代，国际经贸规则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即以处理“关税和边境”上的问题为核心的第一代国际经贸规则。技术传播成本的下降促成了以中间品贸易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时代，国际经贸规则的核心逐渐从“关税和边境”上的问题转向影响全球价值链运行的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等边境后措施，形成第二代国

际经贸规则。目前，人类正在开启由人员流动成本下降促成的以服务贸易，尤其是数字贸易扩张为主要特征的新全球化时代，国际经贸规则的边界将逐渐扩展到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等领域，以数字贸易规则为核心的第三代国际经贸规则正在酝酿之中。未来的国际经贸规则边界将发生重大变化，更多聚焦于公平竞争、标准和应用适应性等非边境、非物质市场准入方面，数据保护以及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将成为核心议题，知识产权保护将进一步增强，传统的关税、非关税壁垒等物质性市场准入规则的重要性将逐渐减弱。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对国际经贸活动产生颠覆性影响，特别是利用数字和信息技术突破服务贸易中人员流动成本的制约，带来了服务生产和服务消费之间的全球性分离，使得诸多当时的非贸易品变成可贸易品。

#### 四、市场逻辑的内在缺陷加剧发展失衡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巨大正效应，也难以避免产生一些负效应。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主动和强势地位，其获益要大于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过去30年最富国和最穷国人均GDP之差扩大近120倍。目前，各国在经济再平衡上难以达成共识，发达国家仍依赖超宽松货币政策转嫁危机。

经济全球化的负效应是市场失灵在世界范围内的体现。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贸规则的不断向纵深发展，市场逻辑

的内在缺陷不断积聚起吞噬原有规则体系的“内在破坏力”。

第一，国际市场垄断的缺陷。当资本在国内集中到一定程度并在国内市场形成垄断的时候，必然向国际市场发展，从而导致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集中，最终形成国际市场垄断。当前国际经贸规则并没有针对国际垄断进行规制的措施，相反，对专利权国际保护的不断强化，导致专利产品价格大幅提高和跨国公司对专利技术的长期垄断。比如，国际民用客机市场基本被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瓜分，汽车、信息、医药等产业被少数几家公司控制。

第二，金融全球化或称“资本流动自由化”的缺陷。货币信用一旦脱离实体经济独立存在，就几乎不可避免地具有异化于产业资本、不断自我扩张和膨胀的冲动。随着产业资本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金融资本，资本市场的获利更多虚拟化，依靠资本增值积累财富的速度远远快于依靠劳动收入积累财富，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已经沦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殖民地。金融部门巨额的利润是以牺牲其他部门的繁荣和效率为代价的。金融全球化还加剧了财富在全球的转移和全球经济的波动，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监管标准、监督、执行、最后贷款人等全球层面的金融开放基础设施。

第三，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缺陷。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论证了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现象，这是因为资本回报率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国家顶层收入者的税收正在变为或已经变为累退制。2019年6月，包括乔治·索罗斯在内的19名美国亿万富翁联

名呼吁向美国最富有的 0.1%的富豪适度征收“富人税”。美国前 0.1%富豪纳税总额仅占其财富的 3.2%，但收入最低的 99%美国民众纳税总额占其财富的比重高达 7.2%。原因在于资本自由流动导致全球范围的竞次税收政策，国家间税收竞争使各国不得不通过降低企业税收留住资本，跨国公司和各国富豪可通过转移定价或寻求避税天堂等方式在全球实现税负最小化。

因此，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市场逻辑的前两个缺陷更多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拉大，第三个缺陷则会在全球范围拉大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差距。资本作为流动性最强的要素，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所有者都是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税收制度设计保证了“资本收益率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现有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主导推动的全球化产生的分化作用日益加剧。未来，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自动化成本进一步降低，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趋向于向资本和技术密集转型，低收入工作将被大量替代。随着智能化、自动化的进一步发展，全球范围内将会产生大量尤瓦尔·赫拉利所称的“无用阶级”。

## 五、“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世界共同繁荣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重塑全球贸易格局，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此后，习近平在首届“一带一

路”国家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最高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践行多边主义，是在充分倚重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性国际规则体系基础上，赋予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重塑的重大机遇，使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对既有的国际制度进行改革创新，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也是与已有的资本利益导向规则体系形成互补。

中国一方面利用多边合作机制，加强政策沟通，有序推进规则标准对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实现从写意到工笔的转变。另一方面，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建自由贸易区，构建“一带一路”大市场，截至2020年底，中国已经与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签署17个自贸协定，包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冰岛、瑞士等发达国家，以及包括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格鲁吉亚等发展中国家。